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尚会鹏
徐晨阳 摇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摇）数据

摇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辑尚会鹏，徐晨阳著援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圆摇
摇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摇ISBN 摇978-7-摇原园原缘-圆源园原-园

摇Ⅰ援摇中…摇Ⅱ援①尚…摇②徐…摇Ⅲ援文化交流—中日
关系—研究摇Ⅳ援摇G园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摇数据核字 (圆摇) 第 园号

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著摇摇者	尚会鹏摇徐晨阳
责任编辑	何摇清
版式设计	周摇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摇摇传真)
社摇摇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圆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摇邮编
经摇摇销	新华书店
排摇摇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摇摇)
印摇摇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摇摇本	
字摇摇数	千字
印摇摇张	
版摇摇次	年 源月摇北京第 版
印摇摇次	年 源月摇第 次印刷
书摇摇号	ISBN 摇978-7-摇原园原缘-圆源园原-园
定摇摇价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摇版权所有摇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摇摇录

第一章摇国家、政府层面:文化传统与
对外交往模式 …… (员
一、文化与对外交往 …… (员
二、美国的文化传统与美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 (源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外交模式的特点 …… (远
四、日本文化传统与外交模式的特点 …… (怨

事例分析 …… (员缘

第二章摇企业集团层面:中日企业组织的特点 …… (远员
一、文化传统与企业组织 …… (远员
二、企业组织的参与方式 …… (远圆
三、企业组织的统合方式 …… (远源
四、权力和责任模式 …… (远远
五、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 (远苑

事例分析 …… (远愿

第三章 人际关系层面:“个人主义”、
“集团主义”与“间人主义” …… (略)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跨文化研究 …… (略)
二、“间人主义”:中日人际关系的共同点 …… (略)
三、中国和日本人际关系的差异 …… (略)
四、“个人主义”、“集团主义”与生态环境 …… (略)

事例分析 …… (略)

第四章 个人行为层面:道德与行为模式 …… (略)
一、“情境中心主义”:中国人与日本人
道德与行为方式的共同特点 …… (略)
二、中国人与日本人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 (略)
三、中国国民素质提高之途径 …… (略)

事例分析 …… (略)

第五章 日常生活层面:“文化冲击”与
“跨文化理解” …… (略)
一、“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 …… (略)
二、文化的相对性原则与不同文化群体的“共生” … (略)
三、为中日相互理解而努力 …… (略)

事列分析 …… (略)

第六章摇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从人与集团的角度考察 …… (圆藻
一、亚洲金融危机与亚洲式资本主义 …… (圆藻
二、个人与群体 …… (圆苑
三、“缘”与“契约” …… (圆蚤
四、东亚社会的变化趋势 …… (圆藻

后摇记 …… (圆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第一章摇国家、政府层面 :文化摇摇摇摇传统与对外交往模式

一、文化与对外交往

根据现代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利益关系。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此国家交往方面的冲突可以说首先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最能直接反映国家所追求的利益的方面。但文化因素也是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文化层面的冲突。美国学者 [illegible] 哲指出 :“文化,是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最近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都指出,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其他机构团体乃至个人,采取行动和自组运作的基本动力。这些著作还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①

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①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illegible]转引自王晓德著 :《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第一个方面，文化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它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要维护的利益自然首先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等，但同时也包含文化方面的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看待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是建立在谁是威胁和谁不是威胁、该支持什么和不该支持什么之类的基本判断之上的，而这些判断就受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回答。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①从理论上讲符合民族或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都能体现出民族国家对整体利益的追求。虽然这种整体利益在特定情况下有时会被统治者所扭曲而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一种掩饰，但之所以能为其国民所接受，原因恰恰在于所扭曲的利益并不与国家的文化精神相悖逆。②

发生在美国的“怨· 灵’恐怖事件震惊了世界。人们在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之余也不能不再次思考关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问题。现在看来这次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人们通常估计的要大得多。人们可以解释说这次事件是因为经济上与西方世界的落差造成的被剥夺感和绝望在阿拉伯世界凝结成了仇恨，也可以解释说美国不当的中东政策（主要表现为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制裁伊拉克造成成千上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等）得罪了广大阿拉伯世界，但这些至少不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现在已经弄清，“怨· 灵’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大多出身豪门，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在美

① 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 缘页。
② 同上，第 缘页。

国等西方国家生活的经历,因此无法用贫穷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毋宁说从这一事件中看出来的是更大的文化冲突因素。近些年随着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美国是其代表)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看着西方文化像癌细胞扩散一样侵蚀着整个世界并瓦解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普遍感到痛楚、恐慌却又无能为力。在西方文化面前穆斯林面临选择,但他们的“转型”要比东亚社会(中国和日本)的转型遇到更大的文化上的困难,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面临更为严厉的神明的拷问。阿拉伯世界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普遍抬头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形式就表现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那种彻底禁止西方文化影响的做法和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行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经济上的冲突是如何与文化因素纠合在一起并且前者借助后者的形式表达出来 恐怖主义者本·拉登公开以宗教的名义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反对美国,而美国也认为恐怖主义是对美国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挑战,声称向恐怖分子开战是为了保卫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等。他们行为的背后可以说都有“文化利益”的追求,而文化利益的追求又是最能凝聚民众的。

第二个方面,文化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外交的方式和风格产生影响。每个民族国家的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制定外交政策以及采取具体外交行动皆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有密切关系,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从而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的区别他国的烙印。

第三个方面,文化对从事外交的个人产生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合，即他们体现了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利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有许多文化根源。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是分析外交活动本身而是揭示隐藏在外交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这个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和误解，而这些偏见和误解通常是国与国构筑建设性关系的障碍。它也有助于把握一个国家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中长期的预测。在这方面著名的开拓性的研究恐怕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类学家 碰碰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与对外交往模式的分析。她认为日本人的义务与人情、义务与义理等价值模式、“各守本分”和忠诚尚武的精神等赋予了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也赋予了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与外部的交往方式。她的研究工作（后来集中在她的著名人类学著作《菊花与刀》中）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她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有的已经过时，但她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一个民族的对外行为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下面我们试图从整体上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模式中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特点做出概括。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另一个大国——美国的情况作为第三参照物。

二、美国的文化传统与美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摇

美国的外交模式表现出以下几个与其文化传统相关的特点：员爱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相关的进攻性、对外征服性特点。“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个人趋于把

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摇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世界区分为“我”和“我以外”两个世界,相信自我、崇尚独立,趋于把他人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内心有较大的不安全感。个人不仅趋于从征服外部世界中获得“成功的喜悦”,而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趋于从超过对方、压倒对方、战胜对方中获得更大的安全感。这种文化上的特点自然也在美国对外交往方面表现出来。美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基本的出发点是对下述问题的考虑:对方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是不是竞争的对手?如果对方现在还不是对手,那么将来会不会是?为了阻止对方成为威胁和竞争对手、保持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应主动干什么?等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外交模式更重视“人权”、“自由”之类的理念是很自然的。一方面,美国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外交模式,但从另一方面也是进攻性和侵略性的。从较广的意义上说,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近代殖民地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对印地安人的屠杀等,皆出于这种进攻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圆爱与“天赋使命”神话相关的强烈的传教士心态和使命感。

美国人深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惟一正确的并深感有责任将其推遍全世界以拯救“异教徒”。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旨在自觉促进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塞缪尔·亨廷顿也指出:美国官员“吹嘘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美德,称颂美国是一个仁慈的霸主国。他们向其他国家宣扬美国的各项原则、行为和制度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适用。”[①]他们趋于认为他们所珍视的理念(如人权、民主、自由等)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国家主权,当这些理念在世界别的地方遇到麻烦时他们一定要去管一管,这与美国人看到邻居家打孩子或虐待小动物就一定要报告警察是基于同样的价值取向。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载(美)《外交》,[illegible]年猿~源月号。

方式带有某种普遍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但同时它带有传教士心态和霸道的特点。当存在一个较强大的竞争对手时，它的行为还会有所顾忌，一旦没有了对手，容易使其陶醉于“成功的喜悦”，趋于为所欲为而带来危险的后果。

猿援与“惩罚主义”相关的崇尚武力的特点。

为了实现所追求的理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前进路上的障碍。世界像美国的许多动画片所表达的那样分为黑与白、邪恶与正义，魔鬼与天使，倘若世界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他们就要试图改变这个世界。为了战胜对方或者说为了阻止他国对美国的优势构成挑战，就要发展更多、更先进的武器，甚至诉诸战争解决纠纷。美国对那些它认为“胡作非为”的国家进行惩罚（最常用的手段是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而这种“惩罚主义”只是美国人“5分钟前若不回家就关禁闭”的育子模式的一种翻版而已。为了某种它认为的“正义”信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譬如为惩罚某个它认为对其构成威胁的对象可以杀死许多无辜者等。从轰炸南斯拉夫，伊拉克战争到轰炸阿富汗等，都根植于相信武力能解决与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一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美国可以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先进的武器称霸全球，但这决非意味着别的国家都支持它的做法，更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可以拯救世界。美国人也许最终会认识到这种崇尚物质力量、富于进攻性的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给这个世界增添的麻烦可能比它试图解决的麻烦还要多。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外交模式的特点

中国的外交模式表现出下述几个与其文化传统相关联的特点：

员援与人际关系和谐理想相关的和平主义与“独善其身”的特点。

中国外交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霸权”、“和平解决争端”。这些原则决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体现着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相一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以亲属集团为中心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十分稳定的社会圈子中,在这个圈子里,大家要和睦相处、息事宁人,不鼓励为捍卫自己的权力而“据理力争”,认为所有争吵都是不好的,因为这会破坏和谐。传统中国社会的理想是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彻底和谐。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趋于消极保守。这种取向在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关系上的反映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承认“人家有人家的圣人”、“自己活,也让人家活”。中国文化有“尚文”的传统,即主张不是用武力征服而是以文明自身的吸引力来感化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的理想世界秩序是一个扩大了的、和睦的拟亲属集团,这种秩序被表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因而他们对霸权、恃强凌弱者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在冷战时虽有同前苏联短暂的结盟,但很快就破裂了,文化心理上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无法接受前苏联的霸权做法。“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反对霸权、坚定地站在贫穷弱小国家一边的做法同传统中国人的“扶危济贫”、“驱强扶弱”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出于一种相对应的价值观,中国文化传统趋于承认这个世界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认为不同场合适用不同原则,因而无法接受那种认为某些普遍原则比国家主权还重要的观点。人们可以指责这种对外反应模式缺乏对人类某些普遍原则的热心以及只顾及自己的事而对世界不太热心。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它对世界上发生的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似乎不太热心,可以说它将极大的精力投在了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以及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也就是说它至今仍将对外交往的重点放在获得承认、防御攻击之上而不是推销自己、进攻他人之上。

圆爱与历史上长期处于“天朝大国”地位相关的“重义轻利”心态。

中国历史上一直处在东亚的中心，周围国家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形成了强调以道德和文化魅力而不是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文化传统。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是一种“朝贡体系”，中国是被进贡的一方。但从经济上看，中国并不合算甚至总是吃亏，因为外国进贡一些稀奇古怪之物，而中国的还礼价值常常超出贡品的许多倍。久而久之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一种重“名”不重“利”的思路。中国对日本放弃战争赔款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但从文化上看，有一种要体现泱泱“天朝大邦”、“以德报怨”形象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推行的“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所谓“友谊外交”应该说也体现了以取得心理优势为目的的典型的中国式外交风格。这种特点至今仍在中国对外交往的某些方面表现出来。

猿爱与对“天朝大国”的记忆和近代以来受压迫的经历相关的一种特殊心态。

一方面，对过去几千年文明古国辉煌地位的记忆使中国人常常生出一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豪和骄傲，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受列强欺凌的经历（如受西方列强瓜分、受日本的侵略、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围堵）又使中国人生出强烈的被害者意识，这两种意识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民族无意识”，它有时候表现为过度的自我关注和自我膨胀，对外部世界忽视和怠慢，有时候则表现为自卑、敏感、强烈的防备心态，使我们较容易将外国个人和政府的某些行为与我们受压迫、受欺凌的历史联系起来（如提到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会使我们联想到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欺负，遇到与外国人的冲突时候，常常从种族歧视、“有辱国格”的高度加以诠释）。这在对外交往方面的一个表现是：中国人对于内政、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历史认识、中国人在国

外所受待遇、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等问题上通常表现出特殊的敏感。

源爱与“人情”、“关系”等人际关系特点相关的希望同对方建立个人信赖关系的取向。

中国人较重视人与人之间建立信赖关系,善于利用“人情”手段。这一特点在对外交往上的表现是,中国经常采用的“老朋友”外交策略。“老朋友”都受到中国的特别重视,当两个国家关系陷于困难的时候他们被赋予极大的期待,希望通过与他们的良好的关系来打破僵局。例如日本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的有田中角荣、竹下登、海部俊树等,美国有尼克松、基辛格、老布什等。当然,不管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解决两个国家的问题时可以说都有这种期待良好的个人关系发挥作用的想法和做法,但这种做法在中国外交上似乎更经常被采用。

四、日本文化传统与外交模式的特点

日本的外交模式与其文化传统有关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

灵爱与“序列”意识相关的“各守本位”特点。

日本是一个讲究“序列”的社会,本尼迪克特早在缘园多年前曾说过:“日本人是从等级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①日本文化所想象的国际秩序趋于是一个等级序列,即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与之相符的位置,在“要么在我之上,要么在我之下”这样的行为模式下,日本外交给人一种依附强权、缺乏道义的印象是很自然的。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

① 砸爱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灵愿缘年版,第 猿缘页。

到战略目的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日本的“御上”。① 现在日本在对美国和对亚洲的关系上，外交天平的严重失衡可以说也是这种特点的反映：一方面，完全服从美国以至于几乎达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如 [illegible] 悦，日本外交官在外交上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成果，不如说优先考虑的是不要使美国产生不满以及不在国际上孤立。努力集中到获得美国的“御墨付”②。另一方面，却将其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这种外交模式是建立在基于某种“等级”意识之上的，与日本人对自己在所属集团中“序列”比较敏感、较容易服从权威的特点相一致。例如在家里对母亲的依赖和在公司里对上司的依赖等，这就是日本人的“[illegible]”心理。③ 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服从强权倾向类似于依赖一个“亲分”或“御上”式的人物，而这个“御上”的行为本身如何似乎是次要的。在“亲分”与“子分”秩序分明的情况下，日本对外关系上不大可能独断专行地干受国际舆论谴责的事，但却会在“御上”的认可下干这种事或容

① 日语的“おかみ”([illegible]，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上面”、“上方”，汉字记作“上”，前面加“御”读作 [illegible] 汉字记作“御上”)，通常指天皇、朝廷、政府、官厅。有时汉字写作“女将”，则指酒店的女老板。这个词在现代日本人中很流行。日本人会说：“是 [illegible] 的命令”、或者“希望能问一下 [illegible] 等之类的话。“御上”是指“掌握着事情决定权的人”，还有“能够放心地替自己拿主意的人”、“委以作出最后决定的人”。也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日本学者武贞秀士指出了“おかみ”对于理解日本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参见武贞秀士：“日本の [illegible] かみ’と国民”，见“外交政策决定要因研究会”编：《日本の外交政策决定要因》，[illegible] 研究所，[illegible] 年版，第 [illegible] 页。

② 过去日本主君(将军或大名)给家臣带有印鉴或签名的短信，内容通常是指示、命令或许可、认可等内容。见筑紫哲也：《世界の日本人观》，自由国民社，[illegible] 年版。

③ “甘え”(读音 [illegible] 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甘え)。大体上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illegibl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参见土居健郎：《“甘え”の构造》(弘文堂，昭和 [illegible] 年第二版)以及笔者对该理论的介绍，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第 [illegible] 页。



忍“御上”干。日本外交具有较能倾听世界舆论、对外界反应敏感的特点,但一旦这个秩序被打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的外交可能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甚或走上歧路。因此从文化上看仅仅指责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还要考虑如果日本不依赖美国它会依赖谁的问题。

圆圈与“和”、“合意”、“根回し”等人际关系特点相关的“暧昧”特点。

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交比较而言,日本外交具有暧昧的特点。这主要是指以下以经验观察的一些倾向:

——长期以来,日本在国际问题上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回避态度,不明确表达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不仅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态度暧昧,在具体的外交场合也多是默不做声或不置可否;

——日本在做出某项重要决定时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给人一种迟疑不决、决断力不够的印象。有时候不知道责任者、决策者是谁;

——外交上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为达到此目标采取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明确,较缺乏广阔的视野。“当今各国的首脑外交打破了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将国内政治放在国际政治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为增进国家利益而积极进行对外交涉。相比之下,在日本,只有谙熟政党内的抗争、人事安排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领导人。”这样一来,内耗自不待言,眼界当然也受影响。①

——日本首脑和外交家在具体表述和实施对外政策时显得力不从心。例如,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西方先进国家首脑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但日本的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主张,甚至常常显出不应有的“拘谨”。日本

① 唐晖:“试论日本的首脑外交”《日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辑,第 圆缘-猿苑页。

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或者就某些外交问题经常出现“口误”、“失言”和误解等等。

日本外交之所以给人暧昧的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日本夹在东西方国家之间，既是东方国家又是西方国家，文化上属于东方国家而制度上属于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既想讨好西方又不想得罪东方国家。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一身而兼二任”；

第二，经济、科技大国与政治小国地位、战败国地位的矛盾。在地位十分强大或者十分弱小的时候都不会是暧昧的。

第三，从文化上看，与日本社会集团的构造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有关。日本强调集团的和睦，回避直接冲突。在做出决定时候重视“合意”（事前协商，达到全体一致）、“根回し”（与各个关系方面协商），而这通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所以给人一种决定迟缓的印象，也使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很大影响。① 日本政府高官乃至总理大臣的决定都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

猿爱与“岛国意识”相关的过度的被害意识和危机意识。

日本心理学者小此木启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示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一种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认可自己的侵略行为。日本人总是要设置一个自身忍耐力的界限，尽管自身是否弱者还不知道。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声中将积累了长年的仇恨释放出来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偷袭珍珠港。近日我们仍常见在这种传统的心理之下来把握国际问题，这是值得警惕的。也就是说，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攻击的时候，马上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将自己描绘成软弱、无防备的牺牲者的画像，并由此向攻击者要求某种

① “外交政策决定要因研究会”编：《日本の外交政策决定要因》，学习研究所，1988年版，第1—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